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3.013

# 唐生智弘扬佛化再研究

申红利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 唐生智大力宣扬佛化有利用佛教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作为军队精神支柱的用意, 为达此目的, 他需要解释乃至论证其一贯宣扬的佛化与革命二者之间不是相悖的关系, 而是相互促进互为一体的关系, 以便消除众人的疑问。由于唐生智对佛法要义的诠释过于“异想天开”, 有时他对佛法要义的认识与一般人甚至与佛教徒的既有认识存在较大错位, 因而时人对唐生智的做法及解释不以为然, 并对其言行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唐生智之所以会有既维护佛教又破坏佛教这一看似吊诡的举动, 是其对佛教过于自我化理解的必然结果, 而非舆论所断言的“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

**关键词:** 唐生智; 佛化; 军队; 革命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3-0095-07

**引用格式:** 申红利. 唐生智弘扬佛化再研究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3): 95-101.

## Further Study of Tang Shengzhi's Promotion of Buddhism

SHEN Hongli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Abstract:** Tang Shengzhi's vigorous promotion of Buddhism has the intention of using some ideological resources in Buddhism as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the army. To achieve this goal, he needs to explain and even demonstr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revolution, which he always advocated, is not contrary to each other, but promotes and integrates each other, so as to eliminate people's doubts. Because Tang Shengz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is too "whimsical", sometimes his cognition of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rdinary people and even Buddhists. Therefore, people at that time didn't agree with Tang Shengzhi's practice and explanation, and launched a fierce attack on his words and deeds. Tang Shengzhi's seemingly paradoxical act of defending and destroying Buddhism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his over self-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rather than the assertion of "using Buddhism with speculative attitude" by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Tang Shengzhi; Buddhism; army; revolution

**收稿日期:** 2021-03-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所藏侵华战争时期‘满洲农业移民’资料编译与研究”(20CZS05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抗日根据地‘乡村俱乐部’研究”(17CDSJ18)

**作者简介:** 申红利(1987—), 男, 山东菏泽人, 山东农业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中共党史。

民国前期,权势的“流动”及均衡局面被打破,国家陷入动乱时期,武力崇拜盛行,正所谓“民国成立,军烟熏天”<sup>[1]</sup>。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主导之下,各实力派竞相增强势力,以达到保存自己,打击、削弱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军队是各实力派赖以存在的核心要素,“有枪则有权”<sup>[2]</sup>。其时,赏罚、情感笼络或利益共享等传统的驭将治兵之道似不足以满足某些实力派的需要。一些较有远见的实力派转而重视军队的精神教育,唐生智即是一例。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唐生智弘扬佛化的问题仍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甚至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唐生智虔诚信佛,如孙宅巍、文工、范忠程等人<sup>[3-5]</sup>;另一派学者认为,唐生智纯粹是抱着投机的心态利用佛教以实现自己的野心,他本人根本不信佛教,如台湾学者吴相湘<sup>[6]</sup>。当笔者查阅、研读了唐生智弘扬佛化的较多史料后认为,关于唐生智弘扬佛化这一问题,无论是在事实还原方面,还是在学理分析方面均有待深化。

### 一 弘扬佛化的缘起及实践

1924年,唐生智任湘南督办,驻衡阳。史料显示,担任湘南督办的唐生智“痛现实之黑暗”,在精神上较为苦闷,为“求人生之真谛”,遂往长沙二学园求教<sup>[7]20-21</sup>。在二学园,唐生智结识了对佛学有精深研究的顾伯叙居士<sup>[8]315</sup>。顾伯叙早年追随湖南名士傅梅根经营工业、金融、矿产,谋求实业救国并赞助傅梅根从事辛亥革命,后来“愤世嫉俗,孤愤幽忧”,转而“深入钻研人生问题,涉猎佛道典籍”,对儒家经典亦有很深的研究。他精通“天文、地理、五行阴阳之术,为究人生究竟又由学道转而学佛”<sup>[7]21</sup>。在顾伯叙为唐生智多次讲解佛法要义后,唐生智被顾伯叙精湛的佛学造诣所折服,视顾伯叙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决定跟着顾伯叙学佛,并从此开启了二人终生亦师亦友的关系<sup>[8]52</sup>。结识顾伯叙不久,唐生智便接顾伯叙到衡阳,并率领“部下诸将刘兴、李品仙、何键、周斓等拜顾净缘(即顾伯叙——引者)为师,请顾说法”,同时“为求部队有精神支柱,遂请顾净缘在军中布教,所有士兵均发愿学佛,受三皈五戒”<sup>[7]22</sup>。

那么,当时唐生智的军队中到底存在哪些问

题?据杨荫杭观察,当时“人民无事可做,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计断绝,于是乎多饥民。饥民流为盗贼,盗贼编为军人,军人兼为盗贼”<sup>[9]</sup>。军队由盗贼编成,不免有夸大之嫌,但杨荫杭的观察,至少说明部分军人存在土匪行为。美国学者齐锡生亦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区分士兵与土匪越来越困难”<sup>[2]74</sup>。农民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免于饥饿,其在军饷不济的情况下往往沦为土匪,这使得当时军队素质较为低下。

唐生智所招之兵亦不例外。在一次讲话中,唐生智指出,“士兵大多来源于贫苦农民家庭”,当兵是“为着解决饭碗问题”或抱着有朝一日能“升官发财”,而不是“为革命而来的”,“农民运动急速地发展,震撼着这些社会成分的生存,马上就影响于军队”<sup>[10]</sup>。在严酷的社会环境及军事斗争中,唐生智对这样一支军队能否经受住外界的考验显得信心不足。再加上大多数士兵“是文盲或受过极少的教育”<sup>[2]78</sup>,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更为严格的训练,其军纪之差也就不难想象。在唐生智统率的北伐军驻扎武汉时,蒋介石就目睹了各军部人员“三五成群”“玩娼聚赌”以及“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的现象,他愤怒地斥责各“同志如此堕落”,于“国家前途”影响殊大,要求唐生智派人巡查、严惩<sup>[11]</sup>。军纪如此之差,焉能期望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另外,唐生智还发现“打胜仗的军队很容易骄傲”,但一旦遇到挫折就“堕落起来”<sup>[9]12</sup>。骄与怠的交替出现,实乃治军的“大敌”<sup>[13]</sup>。兵不在多而在精。要改变士兵素质低的问题,精简人数、裁弱留强无疑是简易之道,但当时并不具备实施裁军的条件。正如唐生智所言,“军政目前时局混乱,安内攘外皆非有兵不可,大举裁兵离事实太远。”<sup>[14]</sup>于是对军队施以更为严格的训练成了唐生智的不二选择。除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外,唐生智发现很多士兵根本没有任何“主义”或“信仰”,“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认为这样的“军队是没有灵魂的”<sup>[8]38-39</sup>。在跟随顾伯叙学佛的过程中,唐生智逐步意识到佛法上的“大慈大悲,救人救世”及“无我为人”等思想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为了使自己的军队“真正能为人民做点好事”,“真正成为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唐生智将佛教引入军队的精神教育之中,“在部队里也提倡学佛,

传授五戒”<sup>[8]51-52</sup>。力图以此来形塑士兵的精神世界，培养严明的军纪，进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唐生智要求将士一律要“戒酒、戒淫、戒盗、戒谎”<sup>[12]</sup>。为了强化将士的戒律意识，他特制了银质镀金圆形得戒证章，“中书‘佛’字，圆周围[书]以‘大慈大悲，救世救人’八字。背面刊有‘不乱杀、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等字，发给士兵，令其佩戴胸前<sup>[15]</sup>。唐生智要求已经受戒的“官佐兵夫”，“严守戒律，涤除旧染”<sup>[16]</sup>。后来唐生智还专门发布命令，要求未受戒的军队“火速进行补戒”<sup>[17]</sup>。

唐生智将某些佛法要义引入军中作为军队精神教育资源的做法在当时的亲历者李品仙的回忆录里亦有明确记载：“唐师长（指唐生智——引者）是个雄心勃勃的人……训练方面，除了一般的学术科和演习教练认真要求提高水准之外，他还拿出佛教的真传在军队中宣扬佛法作为精神教育<sup>[18]</sup>。”由此也可以看出，唐生智意欲通过这种特殊的精神教育方式，训练出一支精神信仰坚定、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

除军队外，唐生智弘扬佛化的言行还体现在日常的各方面。唐生智出巡边防时曾让“佛学造诣深厚的长老跟随”，令其“现身说法，受戒传经”，期望“感化群黎”<sup>[19]</sup>，每到一处即“布道，授戒，宣讲佛理”<sup>[7]25</sup>。在他的支持下，“湖南佛化会在该省境内建立起了一批佛教讲习所和参拜团体”<sup>[20]</sup>，“湘中佛学盛行，军政各界加入者甚多”<sup>[21]</sup>。唐生智和刘钊不仅“筹集巨款”，在财力上支持佛教，且“常着袈裟诵经”佛寺<sup>[22]</sup>。唐生智曾严厉制止省党部“假借农协公会名义侵占寺产，私擅吊拷僧人”<sup>[23]</sup>，禁止“虐待僧侣”<sup>[24]</sup>。在改组后的湖南省政府未正式成立之前，唐生智因紧急事情回湖北，在走之前还不忘去长沙小吴门外二学园诵经<sup>[25]</sup>。有一次，唐生智从岳州回长沙，湖南省政府接待人员还特意把唐生智下榻的地方所布置的佛堂整理整洁<sup>[26]</sup>。1927年10月23日，《晨报》刊出题为《一片颂扬佛化声》的文章，“长沙市党部趁此次双十节拟办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街运动……由主席周燊报告开会意义。词毕即欢呼……拥护佛化的革命军队，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等口号”<sup>[27]</sup>。据李品仙回忆，唐生智甚至“率领高级干部，定期在特别设置的佛堂听顾和尚（指

顾伯叙——引者注）说法之外，还披上袈裟跟着顾和尚从事修炼并参加各项法会”<sup>[18]60</sup>，在自己所用的信笺上概印“大慈大悲”<sup>[28]</sup>等字。由于唐生智竭力宣扬佛化，外界对其有“三藏法师”“唐僧”“菩萨”的称号<sup>[29]</sup>。

## 二 “佛学与革命有体用相关之意义”

唐生智把佛教引入军队的精神教育之中，力图以佛教中某些思想作为军队精神教育的资源，想法自然不无道理，但他却面临着一般人心目中的军人形象和悲天悯人的佛教教义尖锐对立的问题<sup>[30]</sup>。二者如何结合在一起呢？这个疑虑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唐生智所认为的佛化之于“革命”的促进关系能否成立。当时，衡阳市民众就明确反对国民党领导“民众佛化”运动。他们认为，“佛化”与革命不能同时并存，因为佛化“以慈悲为本，以不牺牲为贵。现在革命尚未成功，若依照佛性而不牺牲则难达到圆满之目的，欲牺牲而达到此目的则违背佛性，此佛化之宰制革命运动”<sup>[31]</sup>。

另外，当时佛教或者佛教徒在维新人士脑海中的形象比较负面，激进的维新人士对“佛教徒深恶痛绝”，甚至把他们当作“禄蠹”“以迷信骗人的寄生虫”<sup>[32]</sup>。这必然会给以佛治军的唐生智带来道德或舆论上的压力。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质疑乃至压力，唐生智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且有说服力的回应或解释，否则，他的这种做法就难以奏效，甚至可能会强化质疑者本有的疑虑。对此，唐生智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解释。

针对一般人心目中的军人形象与佛教戒杀教义之间的冲突问题，唐生智解释说，佛化的士兵可以“杀人”。他说，“我们的枪刀是杀那社会上的歹人，不是杀好人的，不是乱杀的。所以我们一举一动都要表现我们是大慈大悲、救世救人”<sup>[12]</sup>。可见，在唐生智看来，杀“歹人”、留“好人”就是佛教意义上的救世救人。

由于唐生智对佛法要义的理解直接来源于顾伯叙的讲授，所以有必要关注顾伯叙如何解释一般人心目中的军人形象与佛教戒杀教义之间的冲突问题。曾有人诘问顾伯叙，“佛家戒律中的第一戒就是戒杀，军队打仗就是大杀特杀的，既然要戒杀何以还要打仗呢？”顾伯叙回应道，“大乘佛法中戒杀的解释不是不许杀，只是不许乱杀，

凡是违背天理,不合人道的都应格杀勿论,‘以杀止杀’正是佛祖大慈大悲、救世的法门”<sup>[18]60</sup>。顾伯叙认为“违背天理,不合人道”的人就应该杀。上述唐生智认为杀“歹人”就是做了佛教意义上大慈大悲之事,其与顾伯叙的观点完全一致。

再来看看湖南军人兼国民党党员何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何健连续3天在长沙版《大公报》上发表题为《学佛与入党》<sup>[33-35]</sup>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何健说:“我们学佛是抱大慈大悲、救世救人的宗旨,我们若仅持此五戒那便偏于消极了……我们固然要大慈大悲,但是军阀和帝国主义不大慈大悲,专于压迫、剥削、侵略大多数劳苦的民众又怎样呢?你少数人大慈大悲不是没有出路吗?”何健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出路,那就是用“革命的手腕去实行三民主义”。他说自己以前学佛是“立大慈大悲、救世救人的心”,“今年入党,信仰三民主义是做大慈大悲、救世救人的事”,“两者既不是各别的,也不是照例举行的,是如何?是要立心行事均本着大无畏的精神去奋斗牺牲的,这是第一件大家应该有[的]彻底明了的见解”<sup>[34]</sup>。显然,在何健看来,用暴力铲除“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侵略”,就等于做了佛教意义上的大慈大悲之事。所以,他认为“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这八个字既是我们学佛军人共同怀抱的宏愿,又是我们革命军人——党军共同怀抱的宏愿”<sup>[35]</sup>。

由此不难看出,唐生智将反抗“压迫”“剥削”“侵略”的行为等同于佛教意义上的“救世救人”。他试图把佛教思想中慈悲济世等奉献或牺牲的精神推广到士兵的精神教育之中,以期增强士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纯化士兵的心灵世界,达到锻造严明军纪、增强军队战斗力的目的。正如李吉荪所言,“顾净缘讲佛法予军队,盖予以佛法无我为人之精神为军人之灵魂也”<sup>[7]22</sup>。

唐生智如此煞费苦心地弘扬佛化,其对军队严明军纪的养成或战斗力的增强有多少裨助呢?据李品仙回忆,“佛家的五戒,戒杀、戒淫、戒盗、戒谎、戒贪以及天堂地狱、罪孽轮回之说虽属渺茫之事,若用之以维持军纪,用佛法、念咒来提高临阵的勇气也颇能发生效力”<sup>[18]60</sup>。顾伯叙以“宗教的说法和仪式在唐生智的军队中来灌输佛教思想”,更利用“一般人信神敬佛的心理从中引导,

遂自然令人起神秘之感,无形中官兵的思想和行为便受到它的约束与指使”<sup>[18]59-60</sup>。北伐时期,苏联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曾指出,唐生智以“佛教为本,孙文主义为用”,治兵是“很有效果的”<sup>[36]</sup>。

针对佛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唐生智亦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佛化意义很深,是觉悟的,有彻底牺牲精神,利他济人,同革命联合只有增加力量的,与国民革命、世界力量决无冲突。因其是空的而不干政治,是使人彻底觉悟,救人救世。有许多人不明佛理,求其保护或升官发财,此是错误。佛不是迷信的,并是打倒迷信的。”<sup>[37]</sup>这反映出唐生智对佛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重视,他坚定地认为,佛化对“革命”能起到积极作用。不难看出,这段话里流露出唐生智对听众可能将佛化与“革命”对立起来或将佛教归为迷信的隐忧。因此,他竭力解释说,那些认为佛教是迷信或佛化与“革命”不相容的观点是对佛法要义的理解有误所致。他认为,佛教本身不是迷信,佛化与“革命”不仅不相冲突,且对“革命”有促进作用。

唐生智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佛化之于“革命”有促进作用这一层面,他更进一步提出,佛化与“革命”是“体”与“用”的关系。在一篇题为《唐生智反对侵提寺产》的文中,他提出,“佛学与革命有体用相关之意义,俾各惕然深省,以尊重党义者尊重佛学,互相策励,互相劝归”,党国前途“实利赖之”<sup>[28]</sup>。时人在《大公报》上撰文,呼应着唐生智的观点,“革命家若能明白佛化,太佛慈悲,能如象佛、菩萨样的无相布施,无畏牺牲,大雄大力、大智大仁、大猛勇、大精进……成功不喜,失败不怠。以之真革命则必可除乱而决非暴民;以之真建设则必可以图公益而决非专横。……今后之青年若真欲作彻底的革命,求新人格之产生,舍佛化其谁与归”<sup>[38]</sup>。该撰稿人最后呼吁湖南青年接受佛化,并坚持认为佛化才是实现“革命”理想、求新人格产生的唯一途径。

在指导湖北农民协会如何开展工作时,唐生智说:“最后我附带说几句,就是中国文化不完全是静的,又有动的。就说佛化吧,不定像一般所说的是死寂,是消极。其实佛的大无畏的精神,自由平等的思想是异常彻底,异常勇敢的。兄弟是相信佛化的,那些迷信的佛化、腐败的佛化都

与真佛的教义无关”。<sup>[10]</sup>唐生智未及听众发问，就对佛化的含义进行了预先回答，显然此预先回答回应的是预先提问。这种带有“提前布防”性质的做法，反映出唐生智意欲规劝质疑者的心态。唐生智将佛化区分为“迷信的佛化、腐败的佛化”与“真佛”的行为，说明他意识到了与佛教有关的迷信活动及其消极影响，这对大力弘扬佛化的唐生智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为了消解这一压力，唐生智需要将自己弘扬的佛化的真正含义予以说明或界定，因而他在此有意将自己弘扬的佛化与“迷信的佛化、腐败的佛化”相区分，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弘扬佛化所受到的压力或质疑。

需要指出的是，唐生智不仅用佛法要义来指导自己的“革命”事业，有时也用自己的“革命”理念来诠释佛法要义。这种诠释掺杂了唐生智不少自以为是的理念乃至执念。下面的一则史料便是显例。唐生智在讨论改革僧伽制度时，要求寺庙和尚“垦殖荒地”“从事农工”，并将寺产“充公”。这些做法遭到了寺庙方丈的激烈抵制，但唐生智的态度极为强硬，他将抗拒不从的方丈收押下狱，并说“我之弘扬佛化，不是保护几个和尚吃饭”。有意思的是，唐生智却将自己的这一行为称作使“秽土变为净土”的善举<sup>[39]</sup>。对于唐生智的这种作法，舆论称之为“异想天开”。

这种对佛法要义极为自我化乃至自以为是的诠释，与一般人以及佛教徒对佛法要义的认知存在着较大的错位，因而舆论对唐生智弘扬佛化的做法并不买账。时人指出，“年来唐生智雄踞两湖，举释迦牟尼、列宁、孙文莫不信手拈来，以供其个人扩张权势之利用”<sup>[40]</sup>。“然唐氏者一面扬言崇信佛化，一面日言反共产即反革命，保护庙宇而听令破坏民产，顶礼释迦而任人抬孔象游街。大抵凡足以供其利用以扩张势力打倒蒋介石以及其他者无不充分利用之。虽明知其非，犹必力称其是。”<sup>[41]</sup>《新光》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评论道，唐生智是利用佛教骗人的“滑头军阀”，他想借用宗教“号召民众慷慨赴死的力量”，以达到个人做“霸主、教皇”的目的。他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可以麻醉人民并使其在昏迷的状态中兴奋，并利用人民在兴奋状态中所发的兴奋以鼓荡个人的声威，他想以宗教的信仰替代主义的

信仰”<sup>[42]</sup>。

### 三 虔诚信佛还是投机利用

那么唐生智究竟是虔诚信佛，还是纯粹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呢？综合研判相关史料，笔者认为，虽然唐生智确有利用佛教中的一些思想作为士兵精神教育资源的用意，这一点上他自己也并不讳言，但他并非舆论所断言的那样，纯粹是抱着投机的态度去利用佛教的。唐生智对佛教的信仰是虔诚的，只不过有时他对部分佛法要义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他自我建构的结果，也正是这一原因导致唐生智为千夫所指，落得佛痞的骂名<sup>[43]</sup>。笔者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唐生智下野，远走日本，同时不忘邀请顾伯叙到日本<sup>[44]</sup>。1941年2月，军医梅英杰结识唐生智后成为了耀祥中学（注：耀祥中学起初叫耀祥书院，是唐生智和顾伯叙于1939年在唐生智的家乡湖南省东安县创立，顾伯叙为山长，1943年改称耀祥中学，唐生智为校长，顾伯叙仍在该中学为学生讲课）的校医，并兼任唐生智的西医医生，伴随唐生智左右。据梅英杰回忆，唐生智“喜欢与顾山长（指顾伯叙——引者）谈佛，有时通宵达旦，总是我陪着他们，我也跟着一起学佛受戒，听他们讲‘布施义’，觉得很有道理，也是一种‘无我’、‘为人’的表现”<sup>[8]174</sup>。1948年下半年，唐生智在为耀祥中学全校师生做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谈到了自己“对佛学也有所研究和爱好”，直言自己“崇佛学”<sup>[8]345</sup>。1950年后，唐生智身居国家高级领导序列，仍“工余不忘佛学”<sup>[7]242</sup>。他临终前寄语佛教同仁，“当执弘扬，改革佛教”<sup>[7]248</sup>。从南京保卫战失败至湖南解放前夕，这一时期的唐生智一直处于无实权无实职的被贬黜状态。如果唐生智是抱着投机的目的利用佛教、利用顾伯叙的话，那么在他的部下被解散、归并，自己也成了孤家寡人的被贬黜期内为什么仍然一直崇信佛教呢？在新中国成立后至辞世前这20年里，唐生智仍念念不忘佛学、弘扬佛教，倡导“改革佛教”，这说明他并非是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利用顾伯叙，他的确是抱着虔诚的态度学习佛法的，他对佛教的信仰亦是虔诚的。

其次，从顾伯叙的角度来讲。由于唐生智是

跟随顾伯叙学习佛法的,在舆论对唐生智弘扬佛法要义的做法或诠释展开猛烈抨击之时,身为唐生智老师的顾伯叙也受到牵连。时人将顾伯叙戏称为“顾和尚”<sup>[7]22</sup>,唐生智的部下李品仙私下也称顾伯叙为“顾和尚”。唐生智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和他(指顾伯叙——引者)一生的交往也确实使许多朋友不易了解,有人以为我迷信他有什么外道法术”。<sup>[8]52</sup>那么顾伯叙是否如部分时人所断言的那样,是打着弘扬佛教幌子以图私利的投机之人或江湖术士呢?答案是否定的。据唐生智自述,他不找顾伯叙,顾伯叙是不找他的<sup>[8]52</sup>。南京保卫战后,唐生智举家迁往湖南省东安县故里,直至抗战胜利。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顾伯叙一直伴随已成光杆司令的唐生智左右,并在东安县附近的兴隆寺禅修、弘扬佛法<sup>[8]336-345</sup>。在湖南即将和平解放前夕,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到唐生智家乡东安县抓捕唐生智,为此他们“一方面硬逼我的老朋友顾伯叙说出我的行踪并将他家围起来,抄了他的家,把他关在零陵的监狱里,受尽虐待,但他无论怎样也没有说出一句话”<sup>[8]89</sup>。如果顾伯叙是贪图个人名利的投机之人的话,恐怕他很难做到宁死也不透露唐生智的行踪,亦很难在长达8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一直追随政治前途未卜的唐生智。如果这些材料说服力尚不充分的话,那让我们再看看其它材料。追随唐生智到日本后,1928年,顾伯叙在日本醍醐流三宝院得受金刚界、胎藏界两部传法灌顶,证得大阿阇梨位。从日本回国后,顾伯叙仍专心弘扬佛法。1930年,顾伯叙在上海创办《威音》杂志。该杂志自1930年1月创刊,到1937年9月停刊,共出版了78期。顾伯叙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佛学著述及译著”<sup>[44]2-3</sup>。再把时限往后延展来看,1950年以后,著名佛学家蒋维乔曾跟随顾伯叙学习密法<sup>[44]4</sup>。天竺文化丛书编委会将顾伯叙一生关于佛学的著述及译著——《顾净缘著述集》列为丛书之一,并认定顾伯叙是“佛教名家大师”<sup>[44]序言</sup>。据当时在耀祥中学学习的学生回忆,顾伯叙“是位学识渊博的长者,佛学造诣尤深”<sup>[8]126</sup>，“对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都很有研究”<sup>[8]347</sup>。由上可知,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顾伯叙就对佛学有着极为精深的研究,并一直坚持了下来,他并非外界所臆测的那样,是打着弘扬佛教

幌子以图个人名利而招摇撞骗的投机之徒。如果唐生智纯粹是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利用顾伯叙的话,恐怕顾伯叙亦很难长时间相伴唐生智左右,并耐心地为她讲授佛法要义。

唐生智将佛教中的一些思想引入军队的精神教育之中,意欲锻造出一支有“主义”、有“信仰”的军队。在唐生智看来,有“信仰”且“信仰”坚定的军队才能够“拿出牺牲精神”,才“能够拼命去干”<sup>[8]222</sup>。正如西方军事理论鼻祖克劳塞维茨所言,“精神力量是战争中最重要主题之一,它们构成了使整个战争中具有生气的主力”,甚至可以说“物质几乎不过是一个木柄,而精神才是利刃”<sup>[45]</sup>。从赏罚、情感笼络或利益共享等传统的驭将治兵之道转向重视军队的精神教育,相较于一般赳赳武夫,唐生智的做法无疑要显得高明几分。唐生智大力弘扬佛化虽有将佛教中的某些思想作为军队精神教育资源的一面,但他并不是舆论所断言的那样,纯粹是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利用顾伯叙。唐生智是一位虔诚的信佛之人,只不过他所信仰的佛教在相当程度上是已被他自我重构的佛教,这种被他自我重构的佛教难免掺杂了唐生智“异想天开”般的理念乃至执念,其与一般人甚至有时与佛教徒所理解的部分佛法要义存在着不小的张力,比如上文提及的唐生智在改革僧伽制度时要求将寺产“充公”的做法,就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正因为这样,舆论才会众口一词地认定,唐生智纯粹是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在军中或日常中大兴佛事、空谈佛理固然有荒唐与可笑之处,但唐生智确乎是依据自己对佛法要义的理解来弘扬佛化的。理论上有时近乎“异想天开”般的诠释,直接决定了实践中近乎任性自为乃至突破底线行为的发生。正因为这样,唐生智对自己的言行违背了佛教要义却不自知,甚至公然认为理所当然。也正是如此,局外人的口诛笔伐与当事人对佛法要义的虔诚信仰相互交织,维护佛教与破坏佛教的言行在唐生智身上吊诡般地同时出现。

#### 参考文献:

- [1] 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8辑[M].成都:四川

- 人民出版社, 1987: 17.
- [2] 齐锡生.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 [M]. 杨云若, 萧延中,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 [3] 孙宅巍. 唐生智论纲 [J]. 学海, 1994(2): 74-79.
- [4] 文工. “佛门将军”唐生智的传奇人生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 11(4): 52-55.
- [5] 范忠程. 北伐时期唐生智的军政建设 [J]. 求索, 1997(5): 109-113.
- [6] 吴相湘. 民国百人传: 第3册 [M].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137-138
- [7] 李吉荪. 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 [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3.
- [8]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政协东安县委员会. 唐生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辑(1889—1989) [M]. 长沙: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1989.
- [9] 杨绛. 杨荫杭集: 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742.
- [10] 佚名. 农民须到军队中去 [N]. 晨报, 1927-07-11(6).
- [11] 佚名. 唐总指挥整饬军纪 [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1-21(1).
- [12] 佚名. 大慈大悲军队 [N]. 晨报, 1927-10-18(6).
- [13] 蒋方震. 国防论 [M].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5: 89-90.
- [14] 佚名. 唐省长出席议会宣布大政方针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6-04-21(6).
- [15] 佚名. 省长发给佛法得戒证章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6-04-20(6).
- [16] 佚名. 唐督办飭属遵守戒律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6-02-19(6).
- [17] 佚名. 总指挥普及军队佛化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7-02-26(6).
- [18] 李品仙. 李品仙回忆录 [M]. 台北: 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 1975: 59.
- [19] 佚名. 欢迎唐督办传经受戒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6-01-10(7).
- [20] 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M]. 范丽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97.
- [21] 佚名. 佛学会发起佛学杂志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5-11-30(6).
- [22] 佚名. 长沙佛教之特采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5-01-21(7).
- [23] 佚名. 唐主席尊重佛学之两要电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6-12-28(6).
- [24] 佚名. 省政府护持佛化通令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7-01-23(6).
- [25] 佚名. 唐生智态度一变 [N]. 晨报, 1927-07-25(6).
- [26] 佚名. 唐生智指摘特别委员会不合法 [N]. 晨报, 1927-10-14(6).
- [27] 佚名. 一片颂扬佛化声 [N]. 晨报, 1927-10-23(6).
- [28] 佚名. 唐生智反对侵提寺产 [N]. 申报, 1926-12-27(7).
- [29] 佚名. 唐生智与各方面之关系 [J]. 国闻周报, 1927, 4(42).
- [30] 张鸣. 武夫专制梦: 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作用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76.
- [31] 佚名. 湘人反对佛化 [N]. 大公报(天津版), 1927-04-26(6).
- [32] 葛兆光. 西潮又东风: 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72.
- [33] 何健. 学佛与入党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7-02-26(7).
- [34] 何健. 学佛与入党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7-02-27(7).
- [35] 何健. 学佛与入党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7-02-28(7).
- [36] 亚·伊·切列潘诺夫.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 [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411.
- [37] 佚名. 昨日唐总指挥招待记者记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7-02-20(6).
- [38] 佚名. 湖南各界男女青年应认识的大乘佛化(续) [N]. 大公报(长沙版), 1927-02-21(7).
- [39] 佚名. 唐生智异想天开大改革僧伽制度 [N]. 晨报, 1927-10-27(6).
- [40] 佚名. 今后之湘鄂问题 [N]. 大公报(天津版), 1927-11-17(9).
- [41] 佚名. 唐生智 [N]. 大公报(天津版), 1927-11-13日(9).
- [42] 佚名. 唐生智与冯玉祥 [J]. 新光, 1929(37/38).
- [43] 佚名. 湘省民众大请愿 [N]. 晨报, 1928-02-24(6).
- [44] 顾净缘. 顾净缘著述集(壹)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2.
- [45]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M]. 钮先钟,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62, 64.

责任编辑：黄声波